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

申请硕士学位论文写作报告

姓 名： 刘博辉

资格证号： 81040303

专业名称： 企业经济学-市场营销方向

拟定学位论文题目：企业社会责任对环境

绩效的影响研究

一、选题依据

|  |
| --- |
| 1.目的及意义（800字以内）  近年来，企业一味的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了“高污染、高能耗、低产出”的生产加工模式给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随之而来的是全球环境的不断恶化，煤炭、石油等天然资源不断开发，森林、湖泊、湿地等面积骤减，土地沙化、荒漠化程度增强，生态系统调节功能不断减弱，造成生物多样性骤减，物种不断消亡，人类的生存环境逐步恶化，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也同样面临这些问题。  企业作为环保相关法律制度的约束主体，在追求经济利益和利润增长的同时也要切实履行相关的社会责任义务，按照法律要求不打折扣地全面落实，并不断完善企业自身的环保体系建设，提出与国家政策相对应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制定环境保护的有效策略。同时积极地配合环保监管，根据相关政策对环境信息进行充分披露，降低甚至消除所在地区的环境风险，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重保障。那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究竟会对环境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企业是否能够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如何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为了探究这些问题，本文选择2011-2020年的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结合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环境绩效等数据，对沪深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企业社会责任对环境绩效的作用机制。结合实证分析结果，对我国上市公司环境绩效的提升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助推我国的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治理工作。   1. 理论意义   本文以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索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内在关系，综合评  价衡量企业社会责任对环境绩效产生的作用，以及上市公司的生命周期、行业、地区及企业性质是否也会影响环境绩效等问题，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绩效关系的理论研究成果。   1. 现实意义   本文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环境绩效的影响，从更深层次引导规范企业的环保治理，为合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企业绿色发展提供了借鉴依据，也为预防企业环境污染重大事故的发生以及提升企业自身的环保意识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

|  |
| --- |
| 1. 文献综述（3000字左右）   （1）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综述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测度。在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实证分析之前，要对其进行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有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学者们主要使用问卷调查法、润灵环球网的社会责任评分、和讯网的社会责任评分等方法来测度企业社会责任。沈艳和蔡剑（2009）等使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对全国12个城市的年销售额大于500万的工业类企业的管理层发放调查问卷调査社会责任表现的情况。尹丽丽（2018）基于问卷调査法，以企业的社会形象、员工满意度以及企业跗近的居民和社区打分作为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代理变量。权小锋等（2015）选用润灵环球网（RKS）基于上市公司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采用指数法进行打分。张正勇等（2018）、杨冬云等（2019）、张雪和韦鸿（2021）也使用该方法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曾爱民等（2020）在使用润灵环球评分作为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础上，还设置了哑变量，即根据企业是否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分别赋值为０和１。油佳利和张永红（2020）在润灵环球对企业社会责任打分的基础上进行赋值调整，大于50分的重新赋值为１，小于50分的重新赋值为０。和讯网基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打分，顾雷雷等（2020）基于对股东责任、消费者和供应商责任、员工责任、环境责任以及政府责任五个层面来定义企业社会责任，选取来和讯网评分来衡量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贾兴平等（2014）、王清刚等（2016）、冯丽艳等（2016）、乔虹（2017）和赵天骄等（2019）也使用该方法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绩效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环境绩效的研究较少，但是研究结论较为统一，学者们从不同行业、不同理论出发，均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能够促进环境绩效水平的提升。部分学者认为，是因为企业披露公众关心的社会责任信息，积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义务，则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行投资，从而将被投资的资金用于改进清洁技术、提倡绿色办公以及进行生态治理等方面，提升环境绩效水平，形成正向循环。冯司妙（2013）基于省份数据发现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的环境绩效的改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企业社会责任能够通过提升环境绩效，进一步提升企业绩效。姜明慧（2014）对一家建筑公司的数据进行研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绩效可以互相影响彼此，一方面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促进环境绩效的提升，另一方面企业积极承担环境责任，提升环境绩效，有利于后期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杨冬云和谢杨（2019）以我国证券市场Ａ股上市公司数据为观测样本，研究了社会责任与环境绩效的关系，他发现上市公司披露的社会贵任信息质量越高，则会吸引更多的投资人进行投资，企业的资金充裕，则会提升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则环境绩效的水平越高，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绩效二者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Cox和Wicks（2011）认为在高度制度化的英美金融市场上，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趋向于更具有价值观的道德商业实践，致力于关注范围更加广阔、价值更长期的上市公司，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提升能够正向显著地影响机构投资者的股票需求，从而使企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环保层面的建设，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Clarkson等（2008）根据经济学信息披露理论，通过抽样调查发现环境绩效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Ahmad等（2021）从微观角度发现了企业社会责任倡议直接或间接地对巴基斯坦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环境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2）环境绩效的文献综述  关于环境绩效的测度。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数据包络分析法、打分法、建立环境绩效指标体系以及使用排污费替代是环境绩效的主流测度方法。一些学者采用数据包络分析（即DEA方法）测度环境绩效。Zhou等（2008）采用环境数据包络分析法进一步讨论了非递增规模收益率（NIRS）和可变规模收益率（VRS）条件下环境绩效的测度研究。Sueyoshi和Goto（2012）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探讨新的环境评估法。Ewertowska等（2016）把生命周期评价（LCA）与数据包络分析相结合研究欧盟主要国家电力层面的环境绩效。蔡晓春和刘晶晶（2017）运用了DEA－Malmquist方法（数据包络法）分析得出制药企业的环境绩效，并运用分位数回归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认为技术提升是其环境绩效改善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些学者采用不同打分方法进行衡量环境绩效水平。陈雯（2012）使用熵权法对我国环境绩效进行综合打分，并研究了环保税费和环境绩效的关联度，排序后发现我国环保税费对环境保护发挥的作用较小，二者关联度较低。周晓慧（2016）基于平衡计分卡为石油行业企业构建环境绩效的综合评价体系。刘永祥和潘志强（2006）认为主成分分析法可用于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评价，而环境杠杆评价法可用于中小企业的环境绩效评价。唐建荣和张承煊（2006）建立BP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后为验证其有效性使用聚类分析，得到效果较好。有的学者则釆用建立指标体系法。陈静等（2006）使用模糊综合评价分析模型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多方面构建企业环境绩效指标体系。申立银和吴德华（2002）设计AHP计算模型为某个建筑施工企业的环境污染进行了评价衡量，并给出诊断意见。Clarkson等（2008）将重点放在纯粹的自由裁量性环境披露上，并根据GRI制定的可持续性报告指南，建立内容分析指数以评估环境和社会责任报告中可自由裁量披露的程度。卢子芳等（2019）使用PCA－SBM模型和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数对江苏省的生态环境治理绩效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动态与静态分析，发现江苏整体的生态环境治理绩效水平较低，且南北部地区差异较大，呈现两极化发展。  国内目前关于企业污染物排放的数据库尚不成熟，资料并不完善以及相关数据有所欠缺。而国内的排污费的征收是根据企业排放污染物的浓度、种类、数量，能反映企业对周围生态的破坏程度以及污染物的综合排放情况。基于排污费的征收标准，有的学者直接使用企业的排污费来衡量环境绩效。胡曲应（2012）认为在我国环境信息披露不足的现实前提下，使用企业缴纳的排污费多少作为衡量环境绩效的水平的高低，这是一个较好的研究切入点，因此使用排污费及其增量来衡量。张长江等（2016）则釆用单位营业收入的排污费。关健和阙弋（2020）使用单位营业收入的排污费的自然对数来作为环境绩效的可量化变量。许慧和张悦（2020）使用排污费的减少量作为环境绩效的代理变量，发现了生命周期对企业的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有显著调节作用。  关于环境绩效的影响因素。一是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环境绩效的相互关系。关于投资者持股与环境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很多，而且大多数研究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促进环境绩效的提升。其中最相关的是余怒涛等（2017）基于化工行业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可以显著正向影响环境绩效。孙俊奇等（2014）发现在股权较为集中的企业中，机构投资者的持股能够通过促进审计质量的提升对环境绩效有正向显著影响。关健和阙弋（2020）基于企业行为理论，通过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进行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对环境绩效有负向影响，反之，期望落差与环境绩效间的关系则无显著影响。有的学者则研究环境绩效对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影响。黎文靖和路晓燕（2015）认为在国有企业中，环境绩效对短期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作用不明显，但能显著提升机构投资者的长期持股比重，环境绩效越优异的企业所能获得的银行贷款成本更低、税负更小，因此企业价值能够长期上升，所以有更高的超额回报。二是企业性质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关于企业性质对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更可能有较高的环境绩效水平。余怒涛等（2017）研究发现董事长和总经理二职合一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均能对环境绩效产生正向影响，而且这种效果在国有企业明显优于民营企业。林立国和楼国强（2014）将上海市企业分为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发现外资企业的环境绩效更高，其原因在于外资企业有更先进的技术，使其生产过程更加清洁，而并非在末端排污较少。Christoann和Taylor（2001）发现跨国公司所有权、跨国客户和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增加了中国企业环境绩效的自我监管。三是环境绩效的其他影响因素。有学者从企业创新角度展开研宄。李杰义等（2019）发现，在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企业中，学习环境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对绿色技术进行创新均可使环境绩效的水平提升，而且学习环境方面的专业知识可以通过加强绿色技术创新从而提升环境绩效的治理水平。李涛和李昂（2019）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发现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的治理水平之间存在倒Ｕ型关系，且这种关系的显著性与政府干预程度、法治水平、企业性质有关。国内外学者关于外部约束和激励对环境绩效的影响也做了很多研究。Dasgupta等（2010）认为中国的监察和执法更能影响工业污染企业的环境绩效。李钢和刘鹏（2015）基于钢铁行业研究了环境管制标准强度对环境绩效的影响，他发现企业加强自身环境方面的管制措施，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治理水平，从而使企业排放的污染物废弃物减少，但是环境管制的强度仍有空间提升。潘红波和饶晓琼（2019）发现2015年实施的新环保法能显著地改善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且改善促进作用与法治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污染治理投资水平有关。王建秀等（2020）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发现社会公众监督能够通过促进政府环境规制水平，从而正向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治理水平。徐莉萍等（2018）使用文本控掘法，提取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代表环境基调的关键词，并将媒体关注作为调节变量，发现促进执行前瞻型环境基调能提升企业环境绩效。武剑锋等（2015）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不利于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并且会抑制环境绩效给予环境信息披露的正向效应。Kirkulak等（2011）认为外商直接投资（FDI）并没有使中国的环境绩效下降。尚洪涛和祝丽然（2018）发现在新能源企业中，政府的直接补贴比税收优惠；更能进一步提升新能源企业的环境绩效，政府发放的直接技术补贴通过企业的环境研发投入对环境绩效中发挥作用。还有学者从企业内部入手研究环境绩效的影响因素。唐国平和万仁新（2019）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研究了“工匠精神”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他发现无论是员工个人还是企业战略，“工匠精神”都能够通过环保投资提升防污染治理能力，均显著地提升了企业的环境绩效。徐杰和陈明禹（2017）基于指数法对石油化工行业企业的环境绩效进行度量，发现我国石油化工行业的环境绩效全样本得分不高，通过制度环境战略能增强企业内部的环保理念，有助于提升环境绩效。  （3）文献述评  从国内外文献来看，目前学界关于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在研究内容上也经历了转变，最初的研究内容是省市等地区之间的差异，现在的大多研究集中于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差异。但是针对于企业层面，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对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对于所研究的概念从测度方法、影响因素等多方面对两者进行了深入分析，初步构建了相关的研究体系，但是现有研究依旧存在一些不足：   1. 国内外学者针对环境绩效的研究主要分为企业内部约束和企业外部约束。从企业外部约束入手的研究主要有机构投资者、监管强度、公众监督、外商直接投资等方面，而针对企业内部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企业性质、工匠精神以及管理者的性别、年龄等因素对环境绩效的影响，从企业生命周期、行业、地区入手的研究有所欠缺，亟待后续研究者补充。   第二，关于环境绩效的测度，由于国外的企业污染物排放数据较为齐全，对环境信息、环保技术、以及环保意识等方面的信息披露较全，因此外国学者更倾向于通过对污染物、环保技术以及环保意识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打分。而国内的相关数据较少，主要以企业缴纳的排污费为主要变量进行衡量。相信随着环保方面条例的进一步健全，相关部门统计工作进一步完善，关于企业环境绩效的研究必能获得长足发展。  第三，在既有文献中，关于现有的企业社会责任对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学者大多集中于企业社会责任对环境绩效的直接作用，在企业实际的运营管理中，企业社会责任对环境绩效的作用过程中可能存在多种影响机制，诸如中介效应或者调节效应。本文尝试引入媒体关注作为中介变量，对企业社会责任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与分析。  上述现有文献的不足与发现，为本文的选题及研究提供了改进和提升的空间。因此，本文尝试引入媒体关注作为中介变量，对企业社会责任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

二、研究方案

|  |
| --- |
| 1.论证方法及数据来源  （1）研究模型  一是静态面板模型。本文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环境绩效的关系，由于行业之间的差异会产生行业效应，年份之间的差异也会产生时间效应，因而选择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二是面板中介效应模型。本文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环境绩效的关系，引入媒体关注作为中介变量，验证中介效应。在探索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时，可能会存在中介变量在二者之间发挥作用，即解释变量通过影响中介变量作用于被解释变量，三者之间存在传导机制，这也就是中介效应。通过中介效应，可以试图探索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关系的内部机制或原理。  （2）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11-2020年的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为了提高研究的客观性与有效性，本文参考姜付秀等（2009）和许慧（2017）处理样本数据的方法：（1）筛选删除ST和\*ST的样本；（2）筛选刪除金融行业的样本；（3）筛选删除公司公开盈利预测情况后一年之内对外再融资的样本；（4）剔除某些变量不完整的样本和年报中未公开排污费等相关信息的样本；（5）为了削弱异常值干扰实证回归结果，把连续型变量在１%分位上进双边缩尾处理后再进行相关检验和面板回归。  企业社会责任数据来源为和讯网每年公布的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分，环境绩效数据来源为上市公司发布的年报，手工收集整理获得，媒体关注数据从知网的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整理获取，其他数据均从国泰安数据库和万得数据库获得。 |
| 2.核心观点  本文以沪深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在建立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后，进行稳健性检验、中介效应分析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本文还对不同生命周期、行业、地区和所有制的企业做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是有差异的。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企业社会责任对环境绩效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企业社会责任评分越高，则企业环境绩效就越高，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2）经中介效应分析，发现企业社会责任通过促进媒体关注能够进一步提升环境绩效，说明可以通过加强媒体监督促进企业环境绩效水平的提升。（3）通过异质性分析，本文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探索发现，在成长期企业中企业社会责任对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只有在成熟期企业，企业社会责任显著促进环境绩效；在衰退期企业，企业社会责任对环境绩效的作用显著。从行业分析来看，相较于非重污染行业的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社会责任对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从地区分析来看，相较于非沿海地区企业，沿海地区的企业其社会责任对环境绩效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从企业所有制分析来看，相对于非外资企业，外资企业中企业社会责任对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有力。 |
| 3.创新之处  本文对已有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绩效关系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发现两者者之间有一定的影响，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对企业社会责任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展开了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是视角创新。一方面，现有针对企业社会责任对环境绩效影响的研究较少，通过整理相关文献，发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的高低能影响环境绩效水平，在媒体的关注下能够有效减少企业中存在的不良行为，媒体带来的社会力量会对公司管理层造成压力，起到监督约束的作用，从而使得企业的环境绩效提高，进而对其展开了理论意义上的分析与实证层面的研究，对媒体关注在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绩效两者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另一方面，本文同时从企业生命周期、行业、地区和企业所有制等不同维度进行多角度分析，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就研究结论给出具体分析，得到更具针对性的研究结果，从而为企业提供具体有效的建议。 |

|  |
| --- |
| 1. 参考文献   [1]Yadav P L, Han S H, Kim H.Sustain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rough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26(03),2017,345-357.  [2] Sidhoum A, Serra T. Corpora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Revisi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mens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6(04),2018,365-378.  [3]Trumpp C, Guenther T. Too Little or too much? Exploring U-shap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26(01),2017,49-68.  [4]Li D, Cao C, Zhang L, et al. Effects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slack,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5), 2017,166-178.  [5]Lin W, Chean J, Azali M, et al. Does firm size matter? 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the green innovation strategy on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 in the automotive sector,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29),2019, 974-988.  [6]Yoon B,Chung Y. The effect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firm performance: A stakeholder approach,*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37(5),2018,89-96.  [7]Quanuey.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s,*Journal of Environ mental Management*, 2017,32(3) .  [8]WONG C W Y, MIAO X, CUI S, et al. Impact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on Operating Income: Moderating Role of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China[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149(2),2016,363-382.  [9] Oyewumi, Ogunmeru. Investment 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sclosure practices,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banks in Nigeria-Science Direct,*Future Business Journa1* 4(02), 2018,195-205.  [10]Sulin Pang, Jinmeng Yuan.Research on Responsibility Reputation on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utation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Based on Listed Company Data,*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7(1),2019, 160-169.   1. 崔也光,李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R&D 投入与财务绩效——基于我国主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8年第二期，60页-69页。   [12]何宜庆，万珍，李政通，“企业负债、社会责任与公司经营绩效——基于规模、资产与股权结构的解释”，《财会月刊》，2018年第六期，3页-10页.  [13]田利军，陈甜甜，“企业内部控制、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二期，75页-82页。  [14]卢正文，刘春林，“基于动机认知视角的慈善捐赠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基本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效应”，《现代经济探讨》，2017年第九期，33页-40页。  [15]靳小翠，“企业文化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吗？——来自中国沪市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会计研究》，2017年第二期，56页-62页。  [16]韩飞，“高管特征、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来自 2009-2015 年上市公司的数据”，《财会通讯》,2017年第十期，12页-15页。  [17]张长江，施宇宁，张龙平，“绿色文化、环境绩效与企业环境绩效信息披露”，《财经论丛》，2019年第六期，83页-93页。  [18]徐莉萍,陆明富,张淑霞,刘宁,“技术性连锁独立董事、技术创新与环境绩效”，《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年第十八期，83页-90页。  [19]油佳利,张永红，“企业社会责任、环境绩效对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中国煤炭》,2020年第一期，18页-23页。  [20]杨冬云,谢杨，“企业社会责任、绿色创新能力与企业环境绩效”，《财会通讯》,2019年第六期，100页-104页。  [21]何林涛,陈璇，“重污染企业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联立方程组模型的分析”，《上海管理科学》,2017年第六期，95页-101页。  [22]杨春,李箐,杨秀萍等，“声誉资本影响企业财务绩效吗？——来自 417 份调查问卷的证据”，《征信》,2020年第一期，21页-27页。  [23]陈秋平，潘越，肖金利，“晋升激励、地域偏爱与企业环境表现：来自Ａ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中国管理科学》，2019年第八期，47页-56页。  [24] 柳学信,孔晓旭,孙梦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提升了企业声誉吗?——媒体关注为中介效应的检验”，《财经理论研究》,2019年第一期，87页-95页。  [25] 王小红,施胜男,陈钰洁，“媒体关注度、财务绩效与环境绩效相关性实证研究——以陕西省上市公司为例”，《管理观察》,2019年第三十一期，147页-151页。  [26]刘柏,卢家锐，““顺应潮流”还是“投机取巧”:企业社会责任的传染机制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18年第四期，182页-194页。  [27]周方召，金远培，贺志芳，“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绩效和风险的影响效应——来自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证据”，《技术经济》，2020年第八期，119页-123页。  [28]蒋天旭，“企业社会责任与绩效关系的实证检验”，《企业管理》，2019年第十九期，167页-170页。  [29]陈可喜,张畅，“研发支出、社会责任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财会通讯》，2018年第二十七期，111页-117页。  [30]阳镇，李井林，“创新工具还是粉饰工具？——业绩下滑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再检验”，《科学学研究》，2020年第四期，734页-746页。  [31]李征仁，王砚羽，石文华，“亡羊补牢：负面记录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及绩效分析”，《管理评论》，2020年第九期，239页-250页。  [32]冯锋，张燕南，“社会责任承担对企业发展的影响：行业竞争的调节作用”，《山东大学学报》，2019年第五期，93页-101页。  [33]陈勖，“声誉在企业社会责任与绩效之间的作用——以商誉作为声誉度量方式的讨论”，《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20第一期，86页-96页。  [34]周虹，李端生，张苇锟，“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顾此失彼还是两全其美？”，《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年第六期，131页-144页。  [35]冯锋,张燕南，“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关系再讨论——基于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数据的实证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六期，154页-166页。 |

|  |
| --- |
| 5.论文提纲  题 目：企业社会责任对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  主题词：企业社会责任 环境绩效 媒体关注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1.1.2研究意义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1.2.1研究内容  1.2.2研究方法  1.3研究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1.3.1研究创新点  1.3.2不足之处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理论基础  2.1.1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2.1.2利益相关者理论  2.1.3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2.2 文献综述  2.2.1企业社会责任文献综述  2.2.2环境绩效文献综述  2.2.3文献述评  第3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3.1 理论分析  3.1.1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绩效的理论分析  3.1.2媒体关注的中介作用分析  3.2 研究设计  3.2.1模型构建  3.2.2变量选取与定义  3.2.3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1.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4.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4.3 中介效应分析  4.4 不同生命周期分析  4.5 不同行业分析  4.6 不同区域分析  4.7 不同企业所有制分析   1. 结论与对策建议   5.1 主要结论  5.2 对策建议 |